



我愛你，中國

何志平

年年「國慶」，今又「國慶」。丹桂飄香於九州，紅葉染醉於萬山。華夏大地，山河錦繡，天地同輝，盛世華誕，共譜華章；巍巍神州，旌旗獵獵，鼓樂喧天，四海升騰；街道兩旁，張燈結綵，普天同慶，處處歡顏。

時維十月，序屬三秋，日日是好日。不論是天氣高爽、雲淡風輕的秋之心曠神怡，還是「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的秋之蕭瑟，總在此特別節點，觸動我們內心最柔軟的地方。

「國慶」一詞，本指國家喜慶之事，最早見於西晉文學家陸機在《五等諸侯論》中「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之記載。封建時代，國家喜慶大事，多以皇帝即位、婚娶或誕辰日為準。帝王通常會在這天大赦天下、賞賜百官、置酒高會、鶯歌鳳舞等，大肆慶祝。

據史料顯示，唐太宗李世民雖最先將自己生日納入國家慶典，但將此定為節日則源於唐玄宗李隆基。其不僅在該天接受文武百官祝壽，還紅燭高燃、笙歌齊鳴、全國放假三天，並把國慶日定為千秋節，意在千秋萬代江山永固；後又突發奇想更名為天長節，寄意與天地共長久。爾後歷代帝王紛紛效仿，既以生日為國家慶典，還各自命名，如地平節、慶成節、慶陽節、壽昌節、延慶節等。至明清，

由千秋節演變成萬壽節，且與元旦、冬至並稱為三大節，在康熙皇帝六十大壽時達至頂峰。

到民國時期，南方起初以十月十日辛亥年武昌起義日為國慶節，家家燃炮，匯眾演說，商戶敲鑼打鼓、舞獅獻瑞，熱鬧非凡，但北方僅機關和學校放假一天，十分冷清。直至軍閥割據結束，南熱北冷之局面才有所改變。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東方巨龍，從此騰飛。同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決議，自次年起每年十月一日為國慶日，中國人民有了完全意義上的國慶節。

國慶節盛大慶典，不僅慶祝國家的繁榮富強，也祈願這片土地生生不息，每一個小家都能在此沃土上安居樂業、和諧共生。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家國安寧，承載着國人滾燙的赤子初心與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期盼，鋪就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濃厚底色。既是山河無恙，更是人心安暖。七十七載風雨兼程，幾代人接力奮鬥。從一窮二白到民富國強，從積貧積弱到巍然屹立，正是億萬人民筆路藍縷、胼手胝足換來的歲歲年年。十里紅旗，千里月光，江山萬里，國之泱泱，是國也是家，是家更是國。

我們生於斯，長於斯，何其有幸，共沐此光榮。

我自幼對紅軍戰士和中國共產黨人尊崇有加，時常為其拋頭顱、灑熱血的偉大壯舉所感動，甚至落淚。及至少時留美求學十六年，親身體驗西方民主之偽善，更激勵着我要為祖國強大發展而不懈進取。一九八四年，懷揣着為國開拓當代眼科事業的夢想與熱情，在香港向外移民浪潮高峰期，毅然放棄優厚待遇逆流回港，並從一九九三年開始，擔任全國政協第八屆委員。

彼時，全國政協中尚未形成香港地區獨立界別，我是以港澳同胞身份作為特邀人士分散在其他界別。但隨着香港回歸籌備工作的推進，在一九九六年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籌委會成立後，方首次以「香港同胞」獨立界別形式出現。第九屆全國政協在一九九八年期間，又將「香港同胞」更名為「特邀香港人士」，並沿用至今。

今時今日，我猶記得一九九三年春節後新華社香港分社於灣仔召開全國兩會行前座談會。共十來個人，我是其中最年輕一位，深感責任重大，忐忑如履薄冰。唯常備不懈，盡全力不負國家信任與重託。等提前一天到京，三月初倒春寒，寒風凜冽。是日晚在貴賓樓報到後，翌日凌晨四點鐘，我們步行往天安門廣場看升旗儀

式。只見四面八方人潮如織，大家秩序井然，緩慢前行。半小時左右到達廣場，夜幕尚未撤去，天氣很冷，風特別大。我們站在最前排，人人裹着大棉襖，帽子圍巾手套齊全，可仍被陣陣冷風吹得瑟瑟發抖。

放眼望去，周邊雖盡是陌生人，可所有人都靜靜地站着，縱然手腳僵硬，眼神卻盯着同一方向，翹首期盼那神聖而莊嚴的時刻。六點，六點三十分，六點四十五分，一聲聲號角突然響徹雲霄，彷彿一把利刃刺破長空，一縷破曉晨光霎時湧出。日出東方，叩啟蒼穹，民族血脈在瞬間沸騰奔湧。金水橋那頭，儀仗隊邁着鏗鏘整齊的步伐，漸次走過長安街。護旗手登上國旗台，將旗掛好。激揚的國歌破空而起，他奮力揮臂，五星紅旗冉冉升起。人們齊聲高唱，沉浸在一片興

奮與激動之中，久久不願離開。

那一刻，我亦心潮澎湃，淚流滿面。國旗並朝陽，日復一日，相映寰宇。愛國是人世間最深層、最持久的情感，升旗儀式更是一堂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課。升起的不僅僅是旗幟，還有心靈深處的信仰與驕傲。每個人的一生，總要看一場升旗。再後來，我多次到京看升旗或閱兵，並和同事推動由二〇〇四年十月一日起，每天在香港各大中文電視台主新聞時段前播出國歌及《心繫家國》短片。日子平淡流逝，可關於那一天的記憶，卻歷久彌新。我們對祖國的愛，很多時候早已刻進骨子裏。可升旗儀式的那份莊重，我始終未曾忘記。因為這面旗上，有我們民族的魂。

千秋偉業，百年只是序章。願祖國偉大，願民族有光，我愛你，中國！



◀十月一日，香港舉行國慶煙花匯演，絢爛煙花在維多利亞港上空綻放，慶祝祖國華誕。新華社

李洱：識君子困厄 守處世公心

「我們平時可能看不到聖人，但是可以看到君子。」分享會上，第十届茅盾文學獎得主李洱引用《既見君子》書中這句話，隨即評價：「徐可就是這樣一個君子。」

李洱與徐可相交多年，昔日同在一個大院共事。在李洱眼中，《既見君子》這本書，正是往日無數次閒談思辨，沉澱之後凝結成的文字果實。

「在這個世界上，君子的道路越走越窄。」李洱拋出的命題，叩擊在場每一位聽眾的心弦。他直指潛藏在文化裏的病灶：「就是那句很可怕的俗話，『寧願得罪君子，不願得罪小人』。」社會默認君子應當大度忍讓，面對小人的譏言與糾纏，便要求君子退避，於是君子的生存空間不斷被擠壓，君子的道路，於是越走越窄。

「但君子不等於老好人，不等於無底線的退讓。」李洱引用孔子「以直報怨」一語：「就是要有公正的這種心態，要尊重一個規範、一個公正的秩序，對這些不平的事情也要有自己的態度。」他援引書中記載的軼事，蘇東坡與王安石政見截然對立，東坡從海南北歸，王安石騎驢在江邊等候多日，二人相見，不談朝堂紛爭，只敘山河風月。兩個人雖政見不同，卻不妨礙彼此人格的互相敬重，君子之爭很多時候無關是非對錯，而是兩種理想、兩種格局的彼此碰撞。

叢治辰：以「情」與「識」重塑君子精神

在評論家叢治辰看來，在「厚黑學」大行其道的當下，徐可耗費十年寫就《既見君子》，把被現實生活沖淡的君子人格重新召喚回讀者眼前，這份寫作本身，就有着極強的現實意義。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書店最暢銷的就是心靈雞湯、成功學。」叢治辰直言，「今天這類東西並沒有消失，只是換了載體，變成網絡上碎片化的帖子。」刷社交平台，隨處可見教人處處設防、步步算計的處世「秘籍」。「如果一個人每天坐臥行走的時候都在想這些事情，我覺得這個人生好像也不大值得一過。」

而歷史散文容易落入「史料搬運」的窠臼。叢治辰提出，寫好這類作品，離不開兩樣東西：「情」與「識」。「情，是寫作者真誠充沛的共情；識，就是獨到見識，要在舊史料裏面讀出前人沒有發掘的啟發。」《既見君子》的可貴，正在於此。

趙健：知識分子文脈接力

《人民日報》推介讀書博主趙健表示，書中令其感觸深刻的是《司馬遷的選擇》，讀者想當然地以為司馬遷寫《史記》是理所應當的本職。可撥開史料便會發現，太史公一職主理的是天文星象、曆法占卜與祭祀，著史並非分內職責。修史既非國家立項工程，沒有經費扶持，更要直面重重風險與非議，本是一件可做不可做的事，一旦落筆就要承受難以想像的沉重代價。

在趙健看來，中國很多知識分子的寫作，冥冥之中也會完成一種默契的接力，比如從《儒林外史》到《圍城》，再到《應物兄》，這正是知識分子寫作生態裏自覺的文脈接力。



大公報AI製圖

彼時鍾老已臥病在床，口齒含混，記憶力卻驚人，當即叫人取來一本書，翻出徐可當年那篇舊文。兩個小時晤談，徐可心中感念，卻不忍開口索求題字。後來經由友人代為轉達心願，久已很少握筆的鍾老，特意在花箋紙上揮毫寫下「既見君子」，一紙墨寶輾轉寄到徐可手上，成為這本珍貴的開篇印記。而當帶着墨香的新書送達老人手中時，老人面對鏡頭，開心地豎起大拇指，更讓徐可感受到來自前輩的溫暖鼓勵。全書人物譜系自孔子始，落筆收於徐可的授業恩師啟功。書中寫屈原、司馬遷、杜甫、蘇東坡，

「幸有君子伴成長」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書名取義《詩經·鄭風·風雨》，分享會上，徐可緩緩講起書名題字背後一段綿延數十年的因緣。早年間還是北師大中文系學生的徐可，一篇書評見報，意外收到著名學者鍾叔河親筆來信，信中前輩對後生多有勉勵。時光倏忽流逝，這次書信往來之後二人竟數十年未曾謀面。二〇二四年四月，徐可赴長沙出差，心裏始終記掛着這位耄耋老人，幾經輾轉，終於獲准登門。



▲《既見君子》新書分享會現場。左起：趙健、徐可、李洱、叢治辰。大公報記者任芳頡攝

跳出固有史料定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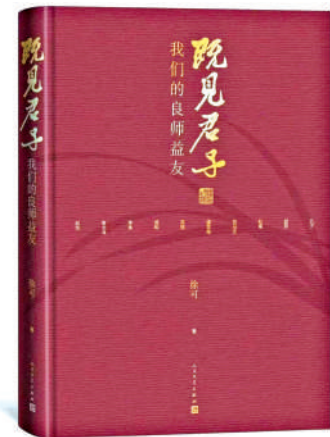
為何要將鄭和、李漁這類傳統認知中非正統聖賢人物，納入君子譜系？「君子不能用一套固化刻板的標尺去衡量。」在徐可看來，鄭和以文名傳世，卻懷揣天下大同的樸素理想，遠航異域播撒和平；李漁被舊時士大夫詬病「文人無行」，卻憑一己技藝立身，不攀附權貴。「評判君子，看的不是出身、職業，而是內心的底線與人格的光輝。不能因為不符合舊的範式，就把他們排除在外。」為了發掘這些被忽略的精神閃光點，他常常要跳出固有的史料定論，重新辨析時代背景，讀懂人物選擇背後的苦衷與堅守。

這部九篇散文的集子，徐可前後耗去整整十年。他給自己立下鐵律：「絕不當史料的搬運工，絕不人云亦云。」每動筆一篇，必先理首海量史料，力求要有新發現、新感悟。寫司馬遷，他拆解出司馬遷一生三次沉重抉擇，細讀《報任安書》字裏行間的屈辱與倔強；寫啟功，則借鑒《世說新語》的片段筆法，擷取一樁樁生活細碎。敘述間他還會偶有風趣調侃，稱蘇東坡是「大宋王朝的優秀青年幹部」，消解歷史人物的

書海漫遊

鬧市燈火璀璨，書香靜自生光。作家徐可攜新作《既見君子：我們的良師益友》近日在北京與小說家李洱、評論家叢治辰、讀書推廣人趙健一道，以「君子精神何以照亮今天」為題，穿越兩千五百年歷史塵煙，叩問何為君子，追問古老的人格理想如何回應浮躁紛繁的現世。那些沉湎於典籍之中的先賢，不再是教科書上扁平的符號，經由散文的擺渡跨越時空，化作我們身邊可以促膝交談的良師益友。

厚重隔膜，「希望讀者讀起來，就好像在跟古人聊天。」十年磨文，在快節奏的當下近乎是一種「奢侈」的事。徐可並不諱言，這樣的寫作帶有一份「犧牲精神」。「一年大概只出一篇，要是靠這個養家餬口，早就餓死了。」這句自嘲引得現場會心一笑。對他而言，驅動自己堅持下去的，是一份寫作者的責任：不願看到先賢被簡化為考試填空的名詞，希望把活生生的人還給讀者。他強調，歷史文化散文，不是簡單堆砌資料，要有屬於寫作者的共情、見識與溫度。現場讀者接連拋出現實的困惑：倘若堅守君子品格和世俗成事目標發生衝突，該如何自處？徐可的回答平實而懇切。君子並非不食人間煙火，「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們不必人去做人，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從身邊點滴小事做起，保有一份善意，就是普通人可以踐行的君子之道。」



▲《既見君子：我們的良師益友》，徐可著，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二六年五月。

大公報記者
任芳頡北京報道